

认识论、真理观与美学问题

——“美学大讨论”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方法论反思

李圣传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反映论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原则, 主张人的认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 除认识论、反映论外, 还蕴含着其他丰富多元的方法论思想。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继承中,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论著集中阐发并系统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受列宁思想影响, 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苏联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均沿袭认识论思维模式, 并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文学艺术和美学话语产生铸型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爆发的“美学大讨论”,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的背景下, 列宁阐明的反映论同样成为经典引据, 由此在科学反映与审美活动的混同中导致对美学问题的讨论裹足不前。在对哲学认识论的质疑和反思中,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生产论、价值论、实践论的逐步引入和方法转向, 美学问题讨论在视域调整中才得以纵深推进, 显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方法论上对反映论的艰难突破。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美学; 美学大讨论; 方法论;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中图分类号: B83-0;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3) 10-0144-10

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和“双百”方针形成的话语夹缝中, 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美学大讨论”。关于这一讨论, 学界已从讨论缘起、论争过程、学术意义及派别反思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富有价值的研究。然而,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① 这一美学话语的讨论要求背后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方法论”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事实上, 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 讨论中“各派”美学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中寻经引据, 但“拿来”的思想资源各不相同, 尤其是从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不仅在美学方法论上为论争者提供了不同的视野, 还为美学问题的讨论从认识论过渡到生产论、价值论和实践论提供了方法论反思和转向的思想契机。因此, 围绕“美学大讨论”与哲学认识论, 厘清、反思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方法论, 对重估这场美学论争以及真正科学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的认识论和反映论

众所周知, 文学艺术领域中作为思维方法的反映论源于哲学反映论, 尽管哲学反映论与西方传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 (18VXK0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0FZW018);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六届高等院校“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资助项目 (161090)。

作者简介: 李圣传,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美学与文学理论。

^① 《文艺报》编辑部“编者按”, 《文艺报》1956年第12号, 6月30日, 第34页。

哲学的摹仿论相关,但“主要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产物”,“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兴起促成了反映论”^①。的确,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因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兴起、交织,哲学思维模式也日渐由形而上思辨转向对人类自身能力的思考,由此发生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②。1637年,笛卡尔《论方法》的出版,不仅在“我思故我在”中“动摇了中世纪烦琐哲学的思辨方法和对教会权威的信仰”^③,确立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并存的和要求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的理性主义方法,还使“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在笛卡尔基础上,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首先明确主张将认识论放在哲学的中心位置”^④,并提出“人心如白纸似的,没有一切标记,没有一切观念”,人类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⑤。正是由于建立在感觉、经验及认识基础上,洛克提出观念也是“按照自然方式作用于心灵上的产物”^⑥,也即自然的反映。经验主义哲学诉诸人的感官知觉的审美路向,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先验论的美学思想形成重要影响。而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主义哲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主义”传统进而创造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最终实现哲学变革的重要理论背景。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过“认识论”和“反映论”概念,但作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体系,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根本特征,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中,“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⑦,人的认识从根本上说便是对客观社会存在的反映。对此,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认为:“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⑨因唯物主义哲学强调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就是要强调认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观念”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非机械“镜子式”的摹写,而是主体能动地反映和创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要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⑩马克思是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中解释存在和意识的问题,进而辩证地注意到意识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明确指出:

意识 [das Bewußtsein] 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das bewußt Sein], 而人们
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
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
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⑪

① 汪正龙:《文学反映论:缘起、争论与前景》,《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② 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4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

③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79页。

④ 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4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

⑤ 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3-74页。

⑥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42页。

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节选)》“1872年第二版跋”,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3页。

⑨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

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存在”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换句话说,观念、意识并非机械静止地成像,而是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人的认识过程也就不是简单地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而是有意识的能动地反映过程。意识的能动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审美角度”对现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这一精辟理解和论述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苏联美学家卡冈曾指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美学“把审美看作人的精神积极性的特殊表现(依康德看是判断力,依谢林看是直观,依黑格尔看是精神的自我认识,等等),那末,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把审美看作是人的实践积极性的一种特殊品质了,也就是说,把它看作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世界、然后再以相应的——审美的——方式感受、直观、评价世界的一种能力”^①。可见,与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离开人的历史发展、离开人的社会实践最终导致人的认识及其对世界的反映陷入消极、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论不同,马克思通过科学地将“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不仅将人的认识视为能动的反映,还在实践维度中获得了感性认识的成分,并将认识过程从简单、机械的直线性的反映上升到矛盾复杂的丰富多彩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中,使思维方法跳出静态单一的唯物反映论模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批判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②正是在实践过程中将认识视为人的感性活动和矛盾发展的辩证过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成了一种能动的反映论,并在人的感性活动中焕发着无穷的理论生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志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提到:“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④这种实践观延伸到文学艺术领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思想。可以说,通过将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在人的感性的“能动的反映论”上突破了线性直观的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在现实生活和劳动实践中形成了对现实和艺术世界的审美把握,还将对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的思考从认识论的反映论扩展到实践论、生产论、价值论、生活论、文化论等多个层面。

二、列宁的反映论、真理观与美学问题

反映论原则在列宁的阐发中得到系统化发展。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上新阶段的到来”,还成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方法论基础”^⑤。然而,列宁在论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时,牢牢地将认识过程看作外部世界在人意识中的反映,并与“客观真理理论”相关联。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

正是这个经验使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但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人类的“素朴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⑥

① M. C. 卡冈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②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57页。

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2页。

⑤ M. C. 卡冈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2-63页。

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5页。

可见,列宁将认识论建立在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之上,这也是和“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界限。正是在认识论的唯物反映论立场上,对认识的源泉和物质世界特性的把握才成为可能:“如果你们认为人感知的是客观实在,那么就需要有一个关于这种客观实在的哲学概念,而这个概念很早很早以前就制定出来了,这个概念就是物质。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①列宁对“物质”的定义,既阐明了人的感觉意识的客观实在性,又强调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即事物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客观地存在的,这也为在认识论中正确反映客观真理提供了可能。

在列宁看来,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真理观”问题,但“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以及“马赫主义者”在根本上否定或混淆了“客观真理”。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在对上述诸种思想的批判中努力将认识论和辩证法统一起来,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加强了党性原则,又深刻地揭示了“客观真理”的本质。列宁指出:“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感觉、知觉。这是对的。但试问:‘属于知觉’的,也就是说,作为知觉的泉源的是客观实在吗?如果你回答说是,那你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回答说不是,那你就是不彻底的,你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主义,陷入不可知论。”^②可见,通过对经验批判主义历史的辨析和批判,列宁从唯物主义者的角度描绘了世界,指出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真理性,经验、感觉、知觉等精神层面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作为头脑的机能“是外部世界的反映”^③。据此,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在对客观真理的反映论层面,列宁不仅将这些思想观点应用于认识社会主义生活的方方面面,还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化原理。

列宁的反映论、真理观,还运用到对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的批评论断中,并为“阐明艺术对世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的特点,提供了理论基础”^④。列宁把托尔斯泰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并认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⑤。除了从时代反映、现实认识出发把握艺术外,列宁还从反映论出发将艺术视为认识现实的创造性活动,并为理解艺术活动的社会本质提供了学说基础和哲学依据。此外,列宁更将艺术的阶级性和党性问题与作家艺术的创作自由联系在一起,并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等论著中为解决艺术家的阶级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起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由上可知,尽管列宁在认识论、反映论基础上对“生活、实践的观点”也有阐述,但很显然,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丰富多元的美学艺术方法论,列宁主要是在哲学观上继承并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思想,尤其是在“客观真理论”层面建构了一套系统成熟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体系。这套认识论反映论思想体系,在对“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批判中,不仅与文学艺术、美学问题、艺术的阶级性与党性、世界观以及方法论紧密联系,还对“苏联、东欧及中国的文学反映论以及文艺批评模式建构”^⑥形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反映论模式对中国美学范式的铸型

受列宁反映论思想影响,苏联自1930年初起,在文学艺术各领域积极倡导无产阶级艺术,尤其是在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的推动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新的文学艺术的基本原则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0页。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7页。

③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

④ M. C. 卡冈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⑤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无产者报》1908年9月11日、24日。

⑥ 汪正龙:《文学反映论:缘起、争论与前景》,《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和艺术特征,并被解释为“艺术反映与艺术创作的方法”^①。通过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等作家理论家的主张与实践,这种方法极大地加强了文学艺术与人民生活的联系,要求作家、艺术家在文学艺术中真实地反映生活,以服务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建设事业。

正如1934年8月日丹诺夫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所言:“艺术描写底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和那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种文艺的和文学的方法,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②这种要求苏维埃艺术家在思想上、创作上、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应用到各个领域的尝试,不仅使文学批评变得粗糙且简单化,还使解决美学问题变得困难并显露出明显的缺陷。如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门类艺术实践,原本均有自身独特的审美规律,但在“公式化主义”因素的介入下,不仅艺术的语言和内容发生了变革,还在“片面认识论的处理方法”上导致文学艺术和文化史的美学叙述出现“庸俗社会学”的倾向。^③

这也同样影响了苏联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文艺和美学的探索,尤其是《星》和《列宁格勒》两本杂志刊发的关于文学艺术的各种决议,对文学艺术现象和美学问题持有“命令主义”成分的态度,将原本属于感性的美学艺术探索归结到哲学认识论问题上,把反映论视为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的基础。正是在对认识论反映论方法的强化中,“科学活动—艺术活动”“艺术真实—客观真理”几乎成为同义语,进而将“审美对象”等同于“认识的对象”,即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这种唯物反映论思想也体现在各类论著和教材中,最具代表性的如涅陀希文《艺术概论》一书,不仅从“真理”和艺术反映角度阐明了艺术的认识论功能,以及现实的“第一性”和艺术认识的“第二性”,还将艺术史中的“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同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同起来,^④混淆了艺术方法和哲学方法,在“拉普派”观点的历史回响中陷入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

可以说,列宁系统阐明和构建的哲学认识论原理及其文学反映论模式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的方法论基础。列宁反映论在美学和文学艺术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无形中窄化了马克思主义丰富多元的方法论思想,还使文学艺术批评和对美学问题的探索变得日益机械化和教条化。这种局面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才发生根本性变革。美学研究的兴趣也从认识论的“美的本质”模式逐渐转移到人的审美活动中,开拓出美学研究的价值论、生活论、符号论、文化论等其他方法视域。同时美学向艺术学、语言学、考古学、心理学、技术科学等多领域的延伸,极大地拓展了苏联美学研究的视界,奠定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美学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遗憾的是,当时作为“苏联模式”被源源不断地译介到中国的主要是以列宁斯大林时期美学思想为代表的认识论的反映论模式基础上的文学艺术和美学资源。如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学司《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基础教学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阿·伊·古谢夫和恩·亚·马拉霍夫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基础”教学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瓦斯卡尔仁斯卡娅《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德米特里耶娃等《论苏维埃艺术中美学的问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等成为新中国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然而,正如涅陀希文所言,“艺术与科学一样,是现实的反映”,这种反映“或多或少客观地和充分地再现现实的本质、内容、属性和特点”^⑤,这些论著并没有充分地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精华,更多的是在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阐明的认识

① M. C. 卡冈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2页。

② 日丹诺夫:《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戈宝权译,载《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26页。

③ 参见M. C. 卡冈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④ 涅陀希文:《艺术概论》,杨成寅译,北京:朝花美术出版社,1958年,第9页。

⑤ 涅陀希文:《艺术概论》,杨成寅译,北京:朝花美术出版社,1958年,第9页。

论的哲学基础上对“反映论模式”进行的简单搬用。将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归结为简单反映、现实的简单再现和对现实的简单认识”^①，不但偏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意旨，还对新中国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的理论建构在“前置性”阅读中，产生了铸型式的影响。

四、中国“美学大讨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反映论的固守与突破

因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的原则要求及“苏联模式”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的方法论基础即列宁的反映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方法论的掣肘，“各派”美学均纠缠于“主观—客观”“唯心—唯物”的形上哲辩，机械地搬用哲学领域的认识论反映论原理分析美与美感问题，导致美学发展裹步不前，但是因“各派”美学思想背景和择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差异，也有少数美学家意识到“认识论—反映论”思维模式解决美学问题的局限性，从“唯物反映论”的窠臼中挣脱出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方法论上的突破。

1. 固守和延续：蔡仪、吕荧与“唯物反映论”

在“美学大讨论”中，尽管蔡仪与吕荧在观点主张上差距甚大，前者主张“美是客观的”，后者则在“美即观念意识”的路径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将美客观化的做法。然而，在强化“苏化”唯物反映论的哲学方法论原则上，两者实则异曲同工，尤其是在美学论争的思维方式上，无一例外地谨守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哲学反映论图式。

蔡仪主要依循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阐明的唯物反映论进行立论。依照列宁指出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像”^②进行逻辑推演，从“客观存在不依存于我们的意识，而我们的意识则反映客观存在”^③，顺其自然地得出“美是客观的”这一美学观点。毫无疑问，蔡仪有着异常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但问题的症结在于，他将“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反映论原则硬套在美学问题上，坚持认为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美感也只是对客观存在的美的反映，从而掉入将美“客观实体化”的误区中，因而难以在讨论中赢得众人认同。

而吕荧尽管早在1953年便发表了《美学问题》一文，明确反对蔡仪“美的事物就是典型的事物”的论调，批评其美学思想只是“一种生物社会学，生物学与庸俗社会学的混合物”^④，进而倡导“美是观念”的理论主张，试图从蔡仪唯物主义“客观典型论”中抽离出来。遗憾的是，虽然吕荧在理论上提出“美是一种观念”，但在思维方法的实践运用中，与蔡仪同样陷入哲学认识论的思维窠臼中。吕荧将美视为一种观念和社会意识，却将这种主观化的观念和意识予以“唯物客观”的解释：“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美的观念，它是客观的存在的现象。”^⑤吕荧尽管反对将美“客观化”，注意到了人的主观性和社会生活对理解美的重要性，并提出“美是观念”这一极富主观性的论点，但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依然从“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认识论公式出发，将“美的观念”看成客观的实体性存在。吕荧固守“认识论—反映论”思维模式，在1957年发表的《美是什么》一文中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该文中，吕荧更加明确地指出，美“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现象”，“美是通过生活概念被人认识的”。^⑥

吕荧“美是一种观念”而“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与朱光潜美学存在着某种相似

① M. C. 卡冈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5页。

③ 蔡仪：《论美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批判吕荧的美是观念之说的反动性》，载《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1953—1957》第1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45—47页。

④ 吕荧：《美学问题——兼评蔡仪教授的〈新美学〉》，《文艺报》1953年第16号，8月30日，第25页。

⑤ 吕荧：《美学问题——兼评蔡仪教授的〈新美学〉》，《文艺报》1953年第16号，8月30日，第25页。

⑥ 吕荧：《美是什么》，《人民日报》1957年12月3日，第7版。

性,但因方法论的分野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择取的差异,吕荧遵奉列宁唯物反映论的模式理路又与朱光潜美学发生分离,反倒在思维方法上与“论敌”蔡仪存在更加紧密的理论亲缘。在“美学大讨论”中,对“客观真理”思维方法与“哲学认识论”图式的固守与延续,是蔡仪、吕荧信奉的列宁主义的唯物反映论原则,也是二者美学思想共同遵循的理论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2. 尝试与转捩:朱光潜的“意识形态论”与“文艺生产论”

1956年在《文艺报》的组织策划下,朱光潜发表了自我检讨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承认过去自身文艺思想的“唯心”与“腐朽”,并表示愿意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斩断与西方美学思想的关联,以尽快从“泥淖中拔出来”^①。由于“双百”方针出台,加之朱光潜经过了一系列有组织的批判,态度诚恳,于是在“百家争鸣”气氛中获得了美学讨论的资格。面对黄药眠和蔡仪的批判,朱光潜发表了带有辩解性质的《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②一文,重新提出“物甲物乙说”。尽管“物甲物乙说”与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中的“心物统一说”在观念上一脉相承、内在吻合,但其据以支撑的学理内核已由早期克罗齐的“直觉说”变为了马克思的“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说”。理论话语的改宗,一方面表明朱光潜急于获得“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唯物主义”积极改造的愿望。

朱光潜所谓的“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这一“主客观统一论”思想,对“唯物的”美学观之质疑不言自明。虽然名之为“主客观统一”,但其美学思想仍在“物甲物乙”维度上倾向“物乙”,强调人主观成分的重要性,仍有对早期西方美学话语的承继。从表面上看,朱光潜表示愿意接受唯物反映论,但他在对自己“唯心主义美学”进行清理的同时又有充分的保留,并解释道:“科学在反映外物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不起什么作用,或是只起很小的作用,它基本上是客观的;美感在反映外物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却起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③朱光潜提醒众人“美感的反映”与“科学的反映”不可等同,切不可将“唯物反映论”完全照搬并简单运用到美学问题的分析上。

为进一步突破反映论模式对美学问题的钳制,朱光潜提出在坚持“唯物反映论”的同时,还应足够重视“社会意识形态”。在对讨论中形成的“四种美学观点”进行小结时,朱光潜集中就美学中固守列宁“唯物反映论”的倾向进行批评,并严肃质疑:

美学家们之所以走到这种荒谬可笑的结论,是由于他们死守住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所阐明的反映论,以为这就完全可以解决美学的基本问题,而事实上要完全解决美学的基本问题,列宁的反映论之外,还要加上马克思主义特别针对文艺所说的两个基本原则。^④

朱光潜认为,美学研究坚持列宁的反映论还远远不够,必须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屡次提到的“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一基本原则。因为艺术或美感的反映与科学反映不同,需要经过“感觉”和“美感”两个阶段——“反映论”仅仅适用于第一个阶段,而美感阶段则是“意识形态”对客观现实世界的反映。此外,朱光潜还指出,在反映论外,还应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观点”和“意识形态观点去对待艺术,因为单从反映论去看文艺,文艺只是一种认识过程,而从生产观点去看文艺,文艺同时又是一种实践的过程”^⑤。

可以说,通过反复论争,朱光潜逐步在“意识形态论”上找到了突破唯物反映论思维模式的立

① 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文艺报》1956年第12号,6月30日,第34页。

② 朱光潜:《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载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③ 朱光潜:《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载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21、25页。

④ 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载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3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16页。

⑤ 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载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3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23-24页。

足点。通过“物”（自然形态）和“物的形象”（社会意识形态）、“美的条件”（物甲）和“美”（物乙）的区分，对蔡仪等人将“唯物反映论”作为解决美学问题唯一正宗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了批评和修正。通过加入马克思阐明的意识形态论，在唯物主义立场的前提下调整对美学问题的理解，为在“美的本质”问题上进一步深入审美经验层面提供了可能。客观地说，朱光潜此时对“美与美感”的论述仍没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论路线上找到“实践论”的依托，仍然还只是在平面静态的“心—物”关系层面的阐发上，尚未能完全超越“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论图式，但他对美感问题的诠释已有走出“美感反映美”这一“存在决定意识”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对“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和“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强调，不仅反驳了唯物反映论的观点，还超越了静态机械的反映论模式，为“美的本质”的思考和审美经验、“美与美感”的深入阐发调整了理论方向。

朱光潜在主流话语框架内小心谨慎地尝试突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思维—存在”的哲学命题在美学问题上的机械推演，这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唯物反映论”的框架，将美和美感的解释置于“意识形态论”的哲学基点。但略显遗憾的是，因缺乏“实践论”的理论支撑，朱光潜仍未能完全彻底地摆脱“反映论—认识论”模式阈限。这种思维方法上的限制直到1961年通过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德威尔《论美》，尤其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学习译介后，在“劳动或生产实践”关系层面上对美感、审美活动做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阐发时，朱光潜才真正跳出哲学认识论，转向到“美学的实践观点”^①。

3. 起点与突破：黄药眠“价值论”转向与李泽厚“实践论”萌芽

黄药眠是继朱光潜之后又一位明确对哲学认识论硬套美学问题表达强烈不满的美学家。但与朱光潜不同，由于“生活实践论”的理论支撑，黄药眠在质疑、反思和批评中能够超出哲学认识论的思维图式，在“唯物反映论”之外自觉转向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层面重新思考美学问题。

在讨论中，“各派”美学家因谨守唯物反映论，片面地看待美学同哲学认识论的关系，甚至将美学问题与认识论思维模式捆绑，没能看到认识论之外马克思主义美学方法体系中蕴含的多元方法论思维。正如应必诚先生指出的：“美的问题不属于哲学本体论的问题，美是一种价值，是世界、客体对主体人的意义，局限在本体论的角度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对美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②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曾批判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③马克思还提到，“商品好像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普通的东西”，但“在他是使用价值的限度内，无论我们是从这个观点，说它会由它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或者说这各种属性原来是它当作人类劳动的产物取得的，它都毫无神秘之处。很明白，人会由他的活动，按照于他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状”。^④依据马克思的思考，美作为一种价值属性，是对象符合人的需要时做出的评价，正如价值是“物质化的人类劳动”^⑤一样，美同样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中对象之于主体的价值意义。

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启发，在意识到将哲学认识论方法简单硬套美学问题进行机械推演的不足后，黄药眠自觉转换思维方式——不去追问“美是什么”，而使用“美学意义”“美学评价”等词语，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审美评价”的思想，这便将“美的本质”问题的形而上学思考转入人的审美价值活动中。“本质论”到“价值论”方法论的转换，显示了在美学问题上对哲学认识论的突破。

① 朱光潜：《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载新建设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6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第208页。

② 应必诚：《〈巴黎手稿〉与美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5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兰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兰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2、77页。

早在1956年“美学大讨论”发动之初，黄药眠在《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中，就有意识地思考和运用了“美学评价”“审美评价”。1957年，他在“美学讲坛”所做的“不得不说的话”的重要演讲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美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的审美的评价”，“审美现象首先应该从生活与实践去找寻根源”。^①依照黄药眠此时的美学构想，“美学”与“美”并不能等同，而且也不能用哲学认识论简单硬套美学问题。美学并非单一的“认识—反映”关系，而是人的艺术理想和审美评价。事实上，黄药眠有意回避“美是什么”这一“本质主义”的形上追问，转而探寻“美学意义”，这一思维模式的方法论转换，蔡仪也有所觉察。对此，蔡仪批评道：

按“美学的意义”和“美学评价”，相同于一般所谓“美的评价”；“美学理想”大约相同于“美的理想”或“艺术理想”之类。黄药眠在这里着意避免用“美”之一词而以“美学”代之，当亦自有其用意。^②

蔡仪对黄药眠这一思维模式转变的细微察觉，更加说明黄药眠的确是在意识到照搬列宁“唯物反映论”硬套美学的不足后，在美学方法论上产生思维变革——通过“美学评价”“美学理想”的追问方式扭转哲学认识论的思维圈套，自觉将“美的本质”问题转到价值论层面进行思考。可以说，黄药眠基于“生活实践”对“审美评价说”的运思，是“美的本质”问题价值论的方法转轨，初步形成了“价值论美学”的雏形，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在中国美学语境中的萌芽。^③

与黄药眠的美学思考不同，由于方法论模式的影响，李泽厚对美学的最初思考与蔡仪一样，依循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讨论中遵循“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强调“美是第一性，美感是第二性”的唯物反映论的美学原则，将美看成一种客观性的实体化的存在。当然，与蔡仪自始至终坚守并延续这一方法论不同，年轻的李泽厚能够在美学讨论中不断调整思维方法，尤其是受苏联“社会派”美学启发，通过引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人化”的观点，使其得以从“社会历史实践”的角度去思考美学问题。因此，虽然李泽厚最初在论争中与蔡仪一样坚持唯物反映论，强调“主观—客观”“唯心—唯物”的二元对立，并陷入哲学认识论的美学思维模式中，但通过对马克思“自然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引入，又得以在社会历史关系中提出“社会实践”的美学观点，由此见出“实践论”美学的萌芽。

与蔡仪“物的形象的美是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④及朱光潜“物的形象”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⑤的美学观不同，李泽厚认为，“自然对象只有成为‘人化的自然’，只有在自然对象上‘客观地揭开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时候，它才成为美”，而人之所以能够“在自然对象里直觉地认识自己本质力量的异化，认识美的社会性”，却是“一个长期的人类历史的过程”。^⑥因此，美的本质是“人化的自然”。人不仅是自然的鉴赏者、认识者，同时也应是实践者、改造者。正是将“美的本质”问题转换到社会历史关系层面，李泽厚才日渐突破“反映—被反映”机械静态的唯物反映论，上升到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寻求对审美现象的解释。正因如此，李泽厚批评蔡仪指出，“脱离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根本观点的机械唯物主义是不能回答的。它不能解决具有深刻社会性质的美的问题”，“只有从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回答这问题”。^⑦

可见，在美学讨论中，通过反复批评与反批评，李泽厚从最初的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

① 黄药眠：《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② 蔡仪：《评“论食利者的美学”》，载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7页。

③ 李圣传：《黄药眠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论转向》，《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

④ 蔡仪：《评“论食利者的美学”》，载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9页。

⑤ 朱光潜：《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载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21页。

⑥ 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载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232、236-237页。

⑦ 李泽厚：《〈新美学〉的根本问题在哪里？》，载《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43页。

义》阐明的反映论方法模式过渡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阐明的“自然人化”路径，将思考和阐发美学问题的基点扎根于“实践论”的土壤中。因时代限制，尽管李泽厚早期美学未完全摆脱西方古典“本质主义”的“主客二分”美学模式，但通过对马克思“自然人化”的引入和对“社会历史实践”的阐发，打破了美在“物”与美在“心”的机械静态的唯物反映论模式，将美学的研究视野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层面，这是对认识论美学模式的方法论超越。

结 语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美学问题上的方法论考掘，不难看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的问题之一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择取和运用存在单一性的偏失。受“苏联模式”影响，美学话语资源和思维方法主要是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阐明的哲学认识论之唯物反映论模式的简单化运用。这是蔡仪、吕荧等绝大多数美学家信奉和征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依据，也是导致美学观念要么显得机械教条，要么陷入前后矛盾且难以令人信服的症结所在。然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要求下，除列宁系统阐明的唯物反映论原则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还蕴含着其他丰富多元的方法论思想。朱光潜在对“唯物反映论”的批评中引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论”、黄药眠在对“哲学认识论机械硬套美学”的批评中“闪烁”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以及李泽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人化”思想上生发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均可谓对认识论反映论主导模式的反思和超越。这种美学思维模式上的方法论转向，折射出认识论、真理观在20世纪长时段内对中苏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的巨大束缚和影响，凸显了全面立体理解和辩证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方法的重要性，更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方法论上对唯物反映论话语模式的反思与艰难突围。

责任编辑：刘 扬